

1978年我拜周竹湘先生为师,那年他64岁,我13岁。

看了周晓哥哥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周竹湘老师是江苏阜宁人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周老师是湖北人,因为师母说着一口湖北话,她好像从不说上海话,小哥周曙也在湖北,更主要的是带我去见周老师的外婆(我舅舅沈建华的岳母)是湖北人。

我第一次去周老师家,记得是从常德路一个弄堂的后面进去的,过道非常昏暗,拉开门帘是一个朝北的小屋,依然非常昏暗。师母招呼大家落座,我站在外婆身边,我舅妈也来了,她也能说一点湖北话。外婆跟周老师说这个孩子怎么喜欢画画,怎么聪明,怎么懂礼貌等等。周老师问了些话,就答应了收我这个学生。

周竹湘老师是我拜过的唯一老师,算是入室弟子。

周老师和师母都喜欢我。很多年之后师母还说:“周老师最喜欢你和马莉,他就是说你们会有出息。”马莉是我师姐,成年后在上海师范大学当老师,后来去了德国。

周老师有三个孩子,周晓、周依群、周曙。周晓在上海宝钢工作,也画画写字,退休后做公益,是一个很厚道的人;周依群去了美国,在旧金山当画画老师,性格开朗,言语直率;周曙在湖北,我只见过一面。

周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是到静安公园写生,用棕色的炭精条画一棵树。周老师主张到生活中去写生,画树、画人的动态是入门课。周老师常说徐悲鸿先生如何带他们去写

我的恩师周竹湘

李磊

生,怎么示范。每每说到徐悲鸿,言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。说到徐悲鸿时,他还经常提到俞云阶和朱怀新。周老师说俞云阶和朱怀新都画得好,徐悲鸿先生很鼓励他们,俞云阶出事情后(被打为“右派”),朱怀新持家带孩子非常不容易。周老师曾经带我去太原路俞云阶和朱怀新的家,那房子比周老师家好很多,又大又敞亮,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字“勇猛精进”,还有一幅油画《孵小鸡》,周老师站在《孵小鸡》

前面连连说:“画得好、画得好!”那天俞云阶先生不在家,周老师跟朱怀新先生聊了很长时间。俞云阶先生有一个调皮的儿子叫俞力,很多年后我们成为好朋友,他是上海世博会的创意总监。

周老师家的客堂是好几家人共用的,大家吃饭、会客通常都在这里。周老师在客堂的一角摆一组静物,就让几个学生在这里画水粉画,训练构图和色彩。我只记得马莉与我一起画画,其他人我记不得了。有一次师母说:“刘文西小时候就跟你一样在这里画画。你们知道刘文西吗?”我当然知道,刘文西画得太好了,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大神。后来说起周老师有名的学生还有上海美术电影厂的著名漫画家阿达、导演木偶电影《阿凡提的故事》的导演曲建方等。这些都是我耳



不一般的城市郊野公园

(纸本设色) 鲍莺



新疆有哈密瓜,没想到还有老汉瓜,要不是次子汉儿想得周到,就会跟这口福失之交臂呢。

那日,和“七十迈自驾游”团友们回到乌鲁木齐酒店,路上帅哥导游“小肥羊”就有交代,说是可去大巴扎看看。大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“集市”或“农贸市场”的意思。

乌鲁木齐大巴扎据说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,有“新疆之窗”“中亚之窗”和“世界之窗”称誉。在北京工作的汉儿,一路给我们搜好吃的好玩的。去大巴扎,汉儿推荐的阿凡提观光平台我们登了上去,阿凡提烧烤和表演边吃边看,还专门去品尝了儿子说的网红“马师傅的

最容易适应的是这座城市的静谧。在上海的每个夜晚都宁静安详,我睡得格外深沉。不知为何,梦醒之后,梦境的余韵仍会久久萦绕。来中国前我曾有点担忧:在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,入睡恐怕会是最艰难的事。可当双脚真正踏上上海的土地,我却恍若走进一片辽阔而超现实的梦境——那是一个与我生活的城市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这里的宁静如此浑然天成,直到数周之后,我才猛然生出疑惑:为何数十年来我所熟知的纽约等特大城市皆喧嚣沸腾,唯独上海能这般沉静?

一日午后,我跳开避让一辆悄然滑过的电瓶车时,忽然意识到:上海有时能静得如同乡间居所,正因大多数居民都靠电动汽车与电瓶车出行。在玉佛寺,我曾久久注视着—位在长椅上熟睡的女孩。她衣着雅致,双手交叠枕于脑后,睡得安然,还带着浅浅笑意。我真

油糕”,芝麻红糖馅,外皮焦黄酥脆,内里又香又甜,一咬一口“哇塞”。回到住店,汉儿微信问老妈老爸吃老汉瓜没?听说没有吃,就急了,跟老爸说,老汉儿要吃老汉瓜,马上就给了外卖。上网搜一下才知道,老汉瓜果肉软糯,缺牙的老爷爷、没牙的杂娃子都能吃,只要上下嘴唇一抿,汁水爆进口腔,甜香四溢,选对了齁甜,选错了,基本可以当水喝。它的学名叫“歇克甜瓜”,新疆

“老汉瓜”

刘杰

当地人叫它“柏谢克辛”,意思就是“一包甜,太好吃了”!因此,它也被网友们誉为甜瓜中的“天花板”。有网友评论说,“新疆沙漠里没有的水,都在这瓜里呢”。

正搜得起劲,外卖小哥已把老汉瓜送来了。急不可待地打开,只见果肉晶莹透亮,似苹果绿,又有点浅黄色,瓜心处还有氤氲微红,挑起一块送进口中,绵软舒适,甘甜多汁,真的是大有“冰淇淋口感”呢。说起小儿子外卖老汉瓜,“七十迈”的几位驴友满是惊叹,啧啧,真好,你们的儿子想得太周到了。听到他们这样说,本老汉儿心里真的比吃了老汉瓜还甜呢。

无束、自在如家?

我曾仔细观察过人们的穿搭,大多印着浓艳鲜活的图案——龙、莲花,偶尔也能见到活泼的现代元素。我把这些发现讲给一位常驻上海的时装设计师朋友,她听完笑了笑,为我讲述了这座城市的故事。她说,

上海,格调与静谧的奥秘

(匈牙利)彼得·舒茨

在很多年前,中国人的家和街道不像欧洲那样泾渭分明,邻里本就是一个共同体。跨出自家的门槛之后并非走进陌生之地,而是融入一种日常生活——每个人彼此都知根知底。这份亲密无间的传统在上海一些不那么喧闹的街巷里依然可见。

带着这份认知,在捧着一碗馄饨汤、看着刚洗净的衣物被高高挂在长竿上轻轻摇晃时,我对最爱的那条街竟有了全新的

熟能详的名字。

不久周老师说:“你应该为升学作准备了。”于是他安排我去静安区政协美术学习班(夜校)画人物写生,从头像到半身像,两个小时画一幅。周老师还安排我去他学生包新生在爱国中学办的美术夜校学习色彩。包新生是著名水彩画家,他的学习班主要画色彩,客堂内分两个摊头,一个画静物,一个画人物。包老师不太说话,主要是同学们相互交流,所以客堂里非常热闹。我的第一幅油画人物写生就是在这里画的。

这时是1978、1979年。

1980年我考上了华山中学美术职业班。周老师非常高兴,他带我去走访了几位他的老朋友,应该都是著名画家,名字我很多不记得了。我有印象的是万籁天先生,他是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的导演,长了一个巨大的鼻子,所以我印象深刻。周老师都跟几位老师说我如何聪明,如何努力等等表扬的话。今天回想起来方觉周老师用心良苦,他是在为我的未来铺路。

1986年“版画角四人展”在黄陂北路上海市美术家画廊举办,我的系列版画《太阳鸟》第一次展出。“版画角”是当时上海版画创新探索的一个学术团体,是卢治平等老师对我的提携,吸纳我进入都是版画名家组成的学术团体。周老师来到现场,拉着我和马莉拍了一张照片。周老师说了很多鼓励的话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感恩我的恩师、敬爱的周竹湘先生,感恩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无私帮助我的人。

看到他的身影。

像金老师擅长竞走一样,朱老师擅长的是撑杆跳高。我曾问他一个问题:

这个项目有人写为“撑竿跳高”,也有人写为“撑杆跳高”,一竹一木,究竟哪个对?朱老师说:两种写法都不算错,倒还反映了撑杆跳高这项运动的历史。朱老师开始“说古”:一百多年前,世界上第一次撑杆跳高赛会在欧洲举行时,因当地不产竹子,选手们用的杆子都是木制的,写成“撑杆跳高”有根据;严格地说,“撑竿跳高”是中国写法,因为这项运动传入我国后,许多选手用南方竹子制成的撑杆,利用竹子的轻巧,尤其是它的弹性与韧性,也跳出了不俗的成绩。国际田联首次公布的撑杆跳高世界纪录,就是一位美国选手撑着竹竿创造的。朱老师给



视角。即便拥有2500万人,可只需拐进一条小巷,便能体验到一份来自居民区的亲切欢迎。我也常常留意上海女性的风格。设计师朋友告诉我,19世纪之交上海成为国际港口后,中西方时尚便在此交融共生:除了皮草大衣、真丝旗袍、中式立领,还能见到法式剪裁、英式礼帽,还有意式皮鞋。或许,正是这份鲜明的二元性——东方的雅致与西方的规整,才让如今的上海时尚拥有了这般摄人心魄的魅力。

第一次漫步在原法租界悬铃木树荫的街道上,我恍若走在两个世界的交界:上海独有的鲜明个性里,我瞥见了巴黎、柏林和伦敦的影子。我总想探寻上海女性魅力的奥秘——她们的格调不止于外表,更承载着身份、从容、内心的平和与风采。我曾见过一张1935年的老

早晨起来,读到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:“美好的世界,露水滴落着,一滴,两滴。”

就是这么简单的三行,在另一位波兰诗人米沃什那里,唤起了这样的联想:“寥寥几笔,成了。白雾浩渺寂静,在山中醒来,大雁鸣叫,并辘辘吱吱响,屋檐上有水珠凝成。”

而此时此刻,在我的世界里,凌晨开始、持续了数小时的一场暴雨刚刚停止。我打开窗,不远处的河流的水腥气,比往日浓烈了许多,风提取水流的气息和凉意,吹在我的脸上,如同给我洗了个冷水脸,许多晶莹明澈的水珠,轻柔地滴下,一滴、两滴……源源不断,让我从头疼与失眠中解脱出来。

有一段时间,我曾将自己的头疼与失眠归咎于从童年开始、持续至今的每日长时间的伏案阅读。我痴迷其中,过度投射,无法区分幻想与现实,如同那两位著名的文学人物——包法利夫人与堂吉珂德。文学作品中那些忧伤与痛楚、绝望与虚无,织成密密的罗网,深夜时分裹住我,我动弹不得,近乎窒息,凝视着天花板上的暗影,熬过漫漫长夜。

而就在此时此刻,小茶的诗、米沃什的诗、这清寒的水气,都让我意识到世界如此美好的一面。不知名的鸟儿在河对岸鸣叫,欢快地,跳跃着,让我想起小茶的另一首诗:“一只杜鹃在叫,为了我,为了山,为了山,为了我(换着叫来叫去)”与中国古诗中常用的典故“杜鹃啼血”不同,杜鹃在此处,如同辛弃疾笔下的青山,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,与人发生了如此温暖的生命连接。

文学其实只是真实世界的投影与镜像,与真实世界一样,悲欣交集。它唤醒并强化了我们的感觉。一位读者这样描述小茶的高敏感:“如果说悲凉是命运,是一茶皮肤的神经,那么人世与自然每有一点点温馨划过他的皮肤,也都会引起他皮肤神经的悸动。”诗人对悲凉与温馨同样敏感,他记下了自己的悸动,并将悸动传给我们,如同一石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涟漪。

远离文学,生活中时有巨大的黑暗,我们只是以“瞒与骗”暂时逃避而已,迟早要面对真相。投入阅读,正视淋漓鲜血,直面惨淡人生,就会发现,淋漓惨淡之外,草木依然葳蕤,鸟儿依然啾啾,我的书架上,那些诗静静伫立,即使我的生命结束,它们依然会静静地守护这个世界,守护其他生命,只要你愿意翻开书页。

想起曾遇见一位老人。她突然在路旁的花丛前停了下来,我有些好奇,走近看看她究竟在看什么。原来是一只硕大的蝴蝶,它停在娇柔的粉色花瓣上,翅膀的黑底上有着绚丽的眼睛状的斑纹。我叫不出这只蝴蝶的名字,但依然被它的美深深打动。又有路人停了下来,与我们一起静静地观赏。老人的片刻停留,正如同小茶的诗,将匆匆路过的我们,也带入了一个美丽而真实存在的诗境。文学的作用,大抵如此。

在漫漫长夜之后的清晨,以小茶的这首诗结尾,作为对自己的提醒:“决不要忘记,我们行走在地狱之上,观赏着鲜花。”

我们介绍这些时,如数家珍,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。

我们上学时,使用木杆竹竿来撑杆跳高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学校器材仓库里,放着不少金属杆。那是一种铝合金制品,轻而坚固,却缺乏弹性。朱老师上课示范时,用的就是这种金属杆。那天他摘下眼镜,轻衣短裤,持杆飞

奔,插杆入地,身轻如燕,跃上半空……这与他平日正襟危坐、埋头苦读的样子,简直判若两人。

忽忽几十年过去,撑杆跳高以它日新月异の纪录,抛下原始的木杆竹竿,抛下硬直的金属杆,又淘汰了玻璃纤维杆,迎来最先进的“碳纤维杆时代”。这种新型杆子,撑起了史上最了不起的三位人杰:伊辛巴耶娃、布勃卡、杜普兰蒂斯。俄罗斯姑娘伊辛巴耶娃,2003年后10年间,28次刷新室内室外撑杆跳高世界纪录,是全世界第一个撑杆跳过5米横杆的女运动员;布勃卡曾是苏联、乌克兰国家队队员,职业生涯中35次打破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,是世界上第一个撑杆跳过6米的男选手;杜普兰蒂斯,是以6米17的成绩打破布勃卡世界纪录的那个瑞典青年,是在厦门跳出6米24的那个“黄背心小伙”,也是不久前在东京跳过6米30、第14次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个空中飞人。

可惜朱老师已经过世,没能见到杜普兰蒂斯。要不然,我们一定能欣赏到他对杜普兰蒂斯过杆技术的精彩介绍,也一定能听到他对中国撑杆跳高项目“破局”的精辟见解。

十日谈

外国作家看上海 责编:吴南瑶

明起刊登一组《夜光杯青年写作计划与艺术节学生观摩团》,责编吴南瑶。